

Sep., 2013
No. 5 General 219

甘 肃 理 论 学 刊
Gansu Theory Research

2013 年 9 月
第 5 期总第 219 期

社 会 学

个体化背景下的民间权威与 乡村公共生活

梁 洁

(厦门大学 人文学院, 厦门 361005)

[摘 要] 新中国成立后的社会变革, 国家和市场的双重力量消灭了旧有社会结构中的宗族、社团等共同体, 国家权力的末梢深入基层社会, 但是随着市场化进程的重新启动、国家力量在制度设计上的退出, 社区衰微的状况也在蔓延, 面对草根社会中的种种失范状态, 国家力量及法律体系未必能够面面俱到地解决实际问题。本文试图梳理学界对中国乡村个体化的研究, 并以西方社会学中“共同体”和人类学中“民间权威”两个概念为切入点讨论乡村共同体生活重建的议题。

[关键词] 个体化; 共同体; 民间权威; 乡村公共生活

[中图分类号] C912.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3-4307(2013)05-0069-05

现代生活正在把我们所能想到的一切: 上帝、自然、真理、科学、技术、道德、爱、婚姻, 都转变成“不确定的自由”。所有形而上学的超验的东西, 一切必然性和确定性, 正在被艺术性(artistry)所取代。我们无可奈何地以最公开和最隐秘的方式成为马戏班帐篷中钢丝上的舞者, 很多人从钢丝上跌落下来, 不仅是西方, 在那些陡然向西方生活方式敞开大门的国家中也是如此。在前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波兰、俄国或中国, 人们戏剧性地“跃入了现代性”, 在《个体化》这本书中作者乌尔里希·贝克和伊丽莎白·贝克·吉恩斯海姆如是说。

一、中国乡村的个体化趋势

(一) 个人主义与个体化

《简明牛津辞典》(1990 年, 第八版), 关于个人主义的定义是^{[1]3}:

- (1) 独立和自主的态度或立场;
- (2) 尊重自由的个人行动的一种社会理论;
- (3) 以自我为中心的情感或行为, 即自我主义。

而乌尔里希·贝克和伊丽莎白·贝克·吉恩斯海姆(Ulich Beck and Elizabeth Beck-Gernsheim)将“个

体化”看成一种结构性的概念: “个体化”在某种意义上是制度性的个人主义。他们将社会科学意义上的“个体化”与新自由主义意义上的“个体化”加以区分, 他们认为新自由主义经济学以自给自足的人的形象为基础。它假定, 独立的个体能够把握其生活的全部, 能够从自身内部驱动、更新其行动能力, 但这种观念与工作、家庭、本地社区诸领域中的日常经验(及社会学研究)明显不符。这些领域中的日常经验和社会学研究表明, 个体并非单子, 也不是自足的, 而是与他人的联系越来越多, 包括全球网络层面和制度层面的联系。自足个体这一概念, 最终意味着一切相互义务的消失。^{[2]30}社会学的主要理论家——从马克思经韦伯、涂尔干、齐美尔到帕森斯、埃利亚斯、卢曼、哈贝马斯和吉登斯, 对个体化的叙述存在差别但在他们的观点中贯穿着一条红线——个体化: (1) 是高度分化社会的结构特征; (2) 不仅不会危及社会的整合, 反而是整合得以可能的条件。个体化释放出的个体创造力, 被认为是社会在急剧变迁状态下进行革新的创造空间。基于此, 乌尔里希·贝克和伊丽莎白·贝克·吉恩斯海姆提到: 在高度现代化下, 共同体和相互关系的维持, 不

[收稿日期] 2013-07-15

[作者简介] 梁洁(1984—), 女, 厦门大学人文学院人类学与民族学系博士研究生。

再依赖稳固的传统,而是靠一种吊诡的互致个体化的集体(collectivity of reciprocal individualization)^{[2]30}。

在《个体化》一书中两位作者是从制度化的个人主义这个社会层面来展开“个体化”概念的。他们认为现代社会的核心制度,包括基本的公民权利、政治权利和社会权利,以及维系这些权利所需要的有新工作、培训和流动,是为个体而非群体配备的。基本权利已经内化,人人都希望或必须积极参与经济活动以谋取生计,个体化的漩涡已经摧毁了社会共存的既有基础。因此,他们将“个体化”简单定义为不再重新嵌入的抽离(disembedding without reembedding)^{[2]30}。

除上述的贝克外,西方个体化理论范式的其他两个代表人物分别是鲍曼及吉登斯。

鲍曼将个体化放在结构中来讨论,进一步来说,“个体化”是指人们身份从“承受者”到“责任人”的转型,行动者必须承担完成任务的责任,并对自己行为的结果负全责。对吉登斯来说,“个体化”进程与生活政治紧密相连,选择的权利以及自我的现实是个体化的核心内容。而贝克则认为“个体化”本身就是一种结构,个体化即是“制度化的个人主义”(institutionalized individualism)。集体身份消逝,个人成为社会再生产的基本单位,“过自己的生活”成为一种强烈的趋同性诉求,个体必须通过选择来确定自己的某一身份属性^{[3]329}。

(二)中国乡村社会的个体化趋势

阎云翔认为作为一种理论建构,个体化命题抓住了西欧社会中具有本质性的社会关系变迁模式,但是它在许多方面都与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的变迁模式不同。最显著区别包括:在西欧社会个体的权利与自由一直作为既定事实而受到政治民主的保护;福利国家严格控制着社会不平等的增长;个体身份认同越来越由生活方式和自我理解来确定,而不是由类似家庭或社会阶层等外在的社会团体来定位。结果,日益离不开社会制度的个体必须依靠福利社会提供的安全和财富来维持其“本体论意义上的安全感”(Giddens, 1991)。^{[4]24-28}这个矛盾的发展就构成了“制度化的个人主义”。中国的个体化进程在与西欧社会存在共性的同时,有着自己的特性。

人类学家许烺光在《祖荫之下》一书中指出,中国的个体人格是由中国文化中的5个核心因素构成的:父子关系的中心价值、两性之间的疏远、大家庭的理想、成人式的孩童教育和父母的权威与权力。一种普遍的看法是:中国文化将群体利益置于个体利益之上,个体的存在是为了群体的延续,1949年后,祖荫被国家

所取代。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中提到:“儒家最考究的是人伦,伦是什么呢?我的解释就是从自己推出去的和自己发生社会关系的那一群人里所发生的一轮轮波纹的差序”,这就是中国人社会结构的差序格局。但他同时也认为这种具有伸缩性人际网络,随时随地是有一个“己”作中心的。这又与西方的个人主义不同。个人是对团体而说的,是分子对全体。在个人主义下,一方面是平等观念,指在同一团体中各分子的地位相等,个人不能侵犯大家的权利;一方面是宪法观念,指团体不能抹杀个人,只能在个人们所愿意交出的一份权利上控制个人。这与中国传统观念有所不同^{[3]334}。

市场和国家是促使中国社会结构逐渐个体化的两个推手。市场需要自由和流动的劳动力,国家也需要按照自己的方式刺激经济增长并改变社会结构。改革开放以来,在市场指挥棒的引导下,中国的个体离开家庭、亲属群体、社区或工作单位进入市场经济的大潮之中。如涌入城市寻找工作和生活机会的农民工以及在邓小平南巡后出现的离开机关单位的“下海潮”。这既是贝克所指的脱嵌(disembedding),更多的个体获得自由流动的合法性及机会,在现有社会群体或国家维持的制度之外有所选择。获得解放的个体反过来又重塑着他们与社会群体和社会制度之间的关系,推动后者的变迁。个体已经获得了更多重视,变成在政策制定和文化论争中的一个重要而独立的社会范畴,并反过来导致身份认同政治的出现。在传统中国社会,个体深深嵌入家庭网络和亲属关系中,并被它们所界定;在宗族脉络中,个体仅代表祖先与后裔之间的一个临时点。^{[3]33}解放以后,个体被国家从宗族和社区的权力中解放出来,然后又重新嵌入社会主义大家庭的再分配系统中。公共领域不存在自我身份,个体不是公共话语中的一个独立单位。然而近些年来,个体身份的重要性有所增加,在公共话语中经历了从“我们”到“我”的变化,个体开始把自我与一系列权利联系在一起,因此拓展了将个体视为社会群体一部分的传统观念。^{[3]338}与此同时,并非作为家庭或其他社会群体的代表的个人之间的社会互动构成了“新社会性”^[5]这种新型社会性要求打破约束个体的集体界限,开始把个体当作社会生活的独立单元来看待。随着在社会和地理范围内的流动性不断增加,越来越多的个体发现自己在公共生活中与其他毫不相关甚至完全陌生的个体产生互动关系;在这种互动关系中,个体身份和个体能力比集体身份和群体成员资格更重要。结果,如何与陌

生人互动成为个体化社会的特征与新的挑战。从积极的一面看,与非相关个体互动的新型社会性已经出现并发展起来,如以 NGO 和志愿者行动的形式参与公共事务。非相关个体之间互动的增加也使中国社会的道德价值和信任文化变得个体化。当个体从属于各种社会团体时,他们依靠一种个人信任,只尊重那些在自己的社会网络中的人,范围从家庭、亲属和社区,到更广泛但仍清晰可辨的朋友圈子。个人信任来源于长期与同一群人的互动中,因此它建立在低流动性和范围狭窄的社会互动的基础上。在这样一个熟人社会中,道德标准是由双方的社会距离决定的,陌生人被看做是潜在的敌人因而不值得信赖。相比较而言,在一个高流动性和高度开放的社会,大多数社会互动都发生在没有任何特殊纽带的互不相关的个体之间;在很多情况下,人们不会期待将来再与另一方产生互动。在这样一个陌生人的社会中,社会信任比个人信任更重要,而道德则建立在普世价值观的基础上。社会信任是一种对社会制度的信任,因为社会制度永远依照公开的规则而运作。社会信任还是对专家的信任,因为专家维护这些规则使社会制度运行顺畅;最后,社会信任还相信与陌生人的互动是平和与无害的。从个人信任扩大到社会信任是现代经济和社会得以运行的关键机制之一,也是现代性的一个必要条件。^[6]个体志愿者的例子属于积极的一面,但另一方面,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层出不穷的食品安全问题和“做好事呗敲诈”事件的发生,成为整个社会在更加开放、现代和高流动性的同时陷入道德相对主义和社会信任度下降这一事实的注脚。当上述事实发生在日益个体化的社会中时,社会关系就陷入越来越工具化和碎片化的危险。对个体来说,社会本身也变成充满危险的地方。

阎云翔在《中国社会的个体化》一书中记录并考察了个体在社会实践中的崛起和社会关系结构性变迁导致的个体化进程。他注意到随着党一国家和精英阶层努力通过许多重要的制度变迁摆脱激进政治的影响,从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私营经济显著增长,国家逐渐放松对社会生活的严密控制,社会流动性增强,人们获得更多改善自己生活的机会。但在改革的第三个十年,脱缰野马般的市场经济生产力和强势国家权力的联盟,联手创造了 GDP 增长的奇迹、国家财政收入和能力的快速增长、中国作为世界大国的崛起,与此同时,还导致了社会的两极分化、弱势群体的新困境和自然环境的破坏。他在一次次田野调查当中感受到从农村到城市居民散发出来的生命力、活力和适应力,以及

从困惑、幻灭、鼓舞、希望、兴奋到实际行动的各种表现。他发现,虽然中国仍在现代化的进程中,但与此同时中国社会却展现出第二现代性^①时期的许多个体化特征以及在西方应当属于现代时期甚至前现代时期的其他特点。他长期关注个体在思想和行动方面的快速变化:他们越来越要求自我的发展、个人幸福和安全感,反对由来已久的集体主义道德说教。但同时阎云翔也注意到“无公德个人”的崛起,中国的个体化进程是缺乏古典个人主义由国家主导的个体化。中国个体的发展目标仍属于西欧的第一现代性,例如舒适的物质生活、有保障的工作、福利保障,还有迁移、言论和参与公共事务的自由。但中国的个体也生活在由动荡的劳动力市场、流动的职业、持续增长的个人风险和亲密与自我表达的文化构成的后现代大环境中。中国的个体化个案同时展现了前现代、现代与后现代的状况,中国的个体必须在同一时间应对所有这些状况。中国个体化的复杂过程以这种多层次与多时间纬度的混合为特点;中国的个体、社会群体和国家应对这一巨大社会变革的具体实践将会创造出一种不同的个体化模式。^[7]

二、共同体与民间权威

(一)共同体的定义及重要性

滕尼斯采用二分法的概念,从人类结合的现实,抽象地概括出共同体和社会两种结合类型。滕尼斯认为,共同体的类型主要是建立在自然的基础之上的群体(家庭、宗族)里实现的,此外,它也可能在小的、历史形成的联合体(村庄、城市)以及在思想的联合体(友谊、师徒关系等)里实现。他认为,共同体是建立在有关人员的本能的中意或者习惯制约的适应或者与思想有关的共同的记忆之上的。血缘共同体、地缘共同体和宗教共同体等作为共同体的基本形式,它们不仅仅是它们的各个组成部分加起来的总和,而且是有机地浑然生长在一起的整体。“共同体是一种持久的和真正的共同生活”,是“一种原始的或者天然状态的人的意志的完善的统一体。”在人类的发展史上,共同体这种结合的类型早于有的放矢建立的、个人的结合的“社会”类型。^[1]

共同体的类型有很多种,人们也可以同时从属于

^① 关于“第二现代性理论”,乌尔利希·贝克和伊丽莎白·贝克·吉恩斯海姆将这一理论相应分解成三个综合论断:强制个体化命题(enforced individualization)、风险社会命题、多维全球化(普世化)命题。三个命题遵循同样的论证理路并相互强化。“风险社会”、“个体化”和“普世化”代表着现代化动力的极端形态。由于现代化动力的自我作用,现代化在 21 世纪初取代了第一现代性时代。

多个共同体。商会、专业组织、工作环境、俱乐部、协会以及其他群体,全都可被视为现行的、没有亲属关系的共同体形式。地方或邻里共同体,可以是一个村庄,也可以是乡镇或城市的某一个区域,也可以是一个居住的社区。通过参与共同体和邻里活动,可以激发民众具有一种公共精神的行为方式。^{[8]69}

(二)民间权威

德国社会哲学家马克思·韦伯在研究传统社会制度向现代资本主义制度的转型过程和动因时,创造出一个社会科学理论体系,他认为,权威形态的建构是制度建设的前提,他将“权威”界定为三类:神异性权威(charisma)、传统权威(tradition)与科层式权威(bureaucracy)。“神异性权威”,指的是个人利用创造对众人的福利获得声望,从而具有一定的支配力量和尊严。由于此种权威不经政府界定和干预,因此韦伯又称其为“自然权威”。“传统的权威”,指的是某种制度在长期的存在中,逐步获得公众的承认,成为具有象征力、道德和行为约束力的存在。“科层的权威”,其力量来自于正式的官府以及工作单位上级的任命,以行政等级为其存在的基础,涉及制度的建制,因此是官僚式的。^{[8]269}

由于韦伯关心的是传统社会如何向现代化社会转变,因此他的权威理论颇多地从其演化出发,强调自然式的神异性权威向科层化、制度化的权威演变,以及不同类别的权威如何构成特定社会类别的支配形式。王铭铭认为这一历史社会学的概观存在着两大问题。首先,它忽略了现实社会生活中三种权威之间的互相揉和性和不可分割性。其次,韦伯过于注重社会中正式制度的演变,从而忽略了在非正式的制度场合中“非官方民间权威”的存在及其重要角色。^[9]同时,王认为“权威”特质包括人物、制度以及“神灵”所代表的符号体系。

“民间权威”能够起到维持传统社会秩序,参与乡村公共生活的作用。在传统的中国社会结构中,宗族中通常由族长维持共同体秩序,并主持完成公共事务;乡绅等社会贤达也是地方公共生活不可或缺的力量。而“民间权威”这一元素仍然在当代乡村生活中发挥作用,下面不妨以笔者在云南省和顺镇的田野调查为例来说明。

三、和顺镇公共生活个案^[10]

和顺镇位于云南省保山地区的腾冲县,最初由明朝初年奉命戍边的明朝军户建立,在此之后军户的后代们在此繁衍生息,和顺逐渐发展成为以十个大姓家

族为主体,加上其他少数杂性人口的小型乡土社会。由于靠近缅甸,和顺人很早就有“走夷方”的传统,所谓“走夷方”就是指去缅甸等地谋生。走夷方曾经促成了和顺的繁荣,华侨不仅为当地带来丰厚的物质财富,还带来了外面的新思想。但是半个世纪以来,由于中国的国家政策及缅甸政局的变动,它与外界的联系被割裂,重新回到以农业种植为主的道路上。和顺与其相邻的外部世界从很早开始就有着广泛的交往。当地人在同缅甸的交往中,了解到西方文明,接触到新的观念。这些统统可以在其的历史中找到证据,比如 20 世纪 30—40 年代的崇新会、益群中学、星光音乐会、乡村图书馆、女子篮球队等等。

在“国家权力建设”的过程中,曾经作为社会控制的宗族组织逐渐淡出历史舞台。据笔者的观察,和顺的宗族组织与东南沿海的宗族组织相比,在功能和权力方面都要弱化许多,它们在当地的历史上更多的是扮演着联络族人感情,协调邻里关系,加强姓氏认同的角色和顺地域面积不大,但因为是云南的著名侨乡加上当地文化繁盛,在行政建制上便由乡直接升为镇,下面只有水碓、十字路、大庄三个行政村,所以基本上镇一级的行政权力可以直接到达以家庭为单位的基层,行政村一级的村民自治组织:村支部和村委会,通常是作为辅助镇里政策落实的角色。

现今和顺社会的控制力量看得见的、占主导地位是代表“国家力量”的镇政府,“民间力量”虽然势微,但仍以“民间权威”的形式存在着,并在一定程度上对和顺的大小事务起作用。所谓“民间权威”是指一群有知识和威望的老人。他们形成合力,在一定程度上参与和顺镇公共事务的决策过程。这些有威望的老人,虽然没有硬性的权力来干预和决定当地的发展,但他们以在本土社会脉络中长期积淀而成的传统和威望来间接影响政府的决策过程。这些老人大多受过教育,有文化知识,对家乡感情很深,他们中有的—直工作和生活在当地,有些是在外地工作退休后回到家乡的。和顺镇成立有乡文联、乡老年协会和乡侨联三个组织,老人们是这三个组织的骨干,乡侨联办有《和顺乡》期刊,编辑们定期在乡村图书馆开会商讨办刊事宜及其他公共事务。笔者曾参加了一次这样的讨论会:

2008 年 7 月 18 日,下午两点在乡村图书馆的阁楼召开和顺乡刊出刊讨论会,会议由图书馆的馆长主持,和顺镇的镇长也出席。首先由主编杨老师汇报编刊工作,这一期的重点被确定为:保护 H 镇文化遗产。老人们提议在这一期乡刊上刊登《国务院名村名镇保护条

例》。和顺镇从2003年开始引入旅游开发公司,老人们及在外的和顺镇籍华侨对开发公司对旅游资源的方式有一些不同意见。李老师说:“村里老人和小孩多,公司拉游客的电瓶车随意进出,会对老人和小孩造成危险。”张老师说:“文昌宫是乡人集资所修,应归乡人自由使用,另外图书馆也不该收取门票。”老人们还提议要求政府督促公司把收入情况、分红比例、对当地基础设施投资具体情况明朗化。镇长针对老人的问题发言回复,他认为在外华侨对当地的现状有不满意的地方和有不同意见都是正常的,但他们长期在外不了解国内情况,所以对现状理解有一些偏差。针对乡人们关注的文化保护问题,镇长回复说,他已经在省人大会议上提议促进颁布《和顺古镇保护条例》,倡议成立县一级文化保护委员会,草稿已经写好,省里会派调查组近期下来考察。关于和顺古镇保护经费的来源,他答复说会协调县里、镇里和乡民之间的各方利益,督促企业从经营收入中拿出部分资金作为保护经费。

这次会议可以作为“民间权威”这种社会资本发挥作用的注脚。和顺镇三个组织的成员大部分都出席了这次会议。这些老人除了在关乎和顺发展的公共事务上发声,与政府定期沟通以外,也热衷组织开展当地文化活动、参与公共建筑的修建和维护工作,维护村人利益。正是因为这种传统机制的存在,使得村庄共同体的公共精神得以激发,和顺的乡村生活氛围呈现一种相对良好的状态。

四、结论

个体化背景下,个体日益从外在的社会约束中脱离出来,这些约束包括整体的文化传统和其中包含的一些特殊范畴,例如家庭、血缘关系和阶级地位。所以社会变得更加分化和多元。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传统和社会群体就不再发挥作用;如果它们能成为个体可资利用的资源,传统和社会群体就依然重要。

面对当今中国的社会现状,在中国的文化传统中,有哪些构成要素,能使整个结构在遭遇外部因素干扰时自我修复回到有序发展状态?这是人类学家再进行有关当代中国研究时常思考的问题。人类学家雷德菲尔德提出“小传统”与“大传统”这一对概念。大传统由一个复

杂文明中的精英文化所代表,而小传统则指地方社会民众所承继所发展的文化。在中国社会小传统文化中,有一些道德要素在个体化趋势下仍能发挥作用。

与其他乡村社会一样,和顺也经历从传统乡土社会,到公社化时期,再到重新进入市场经济体系的过程。人口通过外出务工的方式,流动性大大加强;新一代和顺人在婚姻选择等方面也体现了更多的个体化倾向。“民间权威”一直以来都在乡土社会的公共生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明代时的“老人制”¹⁹就是得到官方确认的地方秩序维持模式。

和顺这个公共生活的侧面,对思考当下乡村社会在个体背景下,共同体生活的面相提供了一个窗口。国外的学者提倡在个体化趋势下,重建共同体,以倡导和发挥公共精神。面对阎云翔提出的中国社会个体化趋势,事实上,在乡土社会的原生结构中,有可利用的维系共同体生活,对抗原子化个人及个体化负面部分的传统。“民间权威”在乡土社会中发挥的积极作用,即是其中的一个例子。

参考文献:

- [1] [英]保罗·霍普. 个人主义时代之共同体重建[M]. 沈毅,译. 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0.
- [2] [德]乌尔利希·贝克,伊丽莎白·贝克. 吉恩斯海姆. 个体化[M]. 李荣山,等译. 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
- [3] 阎云翔. 中国社会的个体化[M]. 陆洋,等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2012.
- [4] 费孝通. 乡土中国 生育制度[M]. 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 [5] 沈奕斐. 个体化与家庭结构关系的重构——以上海为例[D]. 复旦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0.
- [6] Giddens, Anthony. The Consequences of Modernity [M].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0.
- [7] [德]滕尼斯. 共同体与社会[M]. 林荣远,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
- [8] 王铭铭. 村落视野中的文化与权力——闽台三村五论[M].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
- [9] 梁洁. 人类学视角下的和顺侨乡[D]. 中央民族大学硕士毕业论文,2009.
- [10] [日]中岛乐章. 明代乡村纠纷与秩序[M]. 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2.

[责任编辑:马 莉]